

## 第五章 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

“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 即宗教和神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 第 328 页)但是由于近代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从十五世纪以来,神学世界观的藩篱便不断遭到冲击。十七世纪便出现了公开的唯物主义思想。到了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已经充分强大,足以建立与本阶级的地位相适应的思想体系时,便在法国产生了反封建的所谓启蒙运动,出现了公开的无神论。恩格斯说:十八世纪法国的这场“哲学革命……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同上 第 305 页)

这些启蒙思想家,以人性论为基石,在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下,建立起了完整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体系。他们在这场反封建、反神学的斗争中,继承和发展了笛卡儿哲学中的唯物主义思想,特别是继承和发展了由培根到洛克的唯物主义经验论,经过自然神论,发展到了公开的无神论。马克思指出,这种理论运动本身,是由法国当时社会生活的实践性质所促成的。

十八世纪上半世纪的法国,还是一个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国家。只有一、二百人的高级僧侣,是国家的第一等级,数万名贵族是第二等级。两者的人口不到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却占有全国绝大部分土地,并且享有不纳税等种种特权。农民、手工业者和资产阶级属于无权的第三等级,却要承担纳税等各种义务。在这个社会内,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天主教

神学，它宣扬君权是神授的，只能服从不能反抗；又说现实生活中的苦难是达到‘彼岸世界’中‘永恒幸福’的考验，只能忍受，不能抗议。力图用这种神赐的圣光来保护住这没落中的封建专制制度。

但是这个制度已经腐朽极了，必然要灭亡了。僧侣和贵族根本不愿过问生产的经营管理，完全过着一种寄生的生活，就是最明显的例证。他们抛弃了自己的庄园，把跑到巴黎来过荒淫无耻的放荡生活，当作是贵族的“体面”。因此横征暴敛，日甚一日。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正如当时法国思想家梅叶所说的，只差对风和云没有征税了。农民收入的四分之三以上都被地主贵族掠夺去了。农业生产极度低落。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据当时人证明，1738—1739年间，法国国内饿死冻死的人数超过路易十四执政期历次战争中死亡的人数。农民和僧侣贵族（地主阶级）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化。所以十七世纪中、下叶便出现了反封建的农民暴动。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行将没落的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了。十六世纪，法国便开始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到十七世纪末叶，新兴的资产阶级逐渐掌握了国民经济命脉。但1661年路易十四亲自执政后，却大力加强封建专制，宣称“朕即国家”排斥资产阶级政治势力。1685年又废除南特敕令，迫使大批新教徒外逃。路易十四还凭借国家权力剥夺某些金融资本家的财产，以充实王室。到路易十五登位之初（1715年），就不得不靠滥发纸币，来维持财政开支。因此，资产阶级和地主贵族的矛盾也就激化了。路易十六的财政总监杜尔阁，曾经采取了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以期缓和这一矛盾。但是这些措施几乎遭到了全体贵族的反对，

很快便失败了。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封建专制政府对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暴力措施，帮助资产阶级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十八世纪三十年代以后，日益强大起来的资产阶级，力图改变政治上无权的地位。但是正如上面指出的，封建君主和贵族不仅排斥资产阶级政治势力，还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极力打击资产阶级，这就迫使资产阶级革命，并从广大群众那里去寻找支持。因此，法国资产阶级在它们革命的年代是比较坚决的。它抛弃了宗教的外衣，公开的在政治基地上作战了。

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正是在这种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毛主席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在反封建的斗争中，法国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首先批判了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想基础——宗教神学，由怀疑宗教，经过自然神论，走上了公开的无神论。对宗教的这种批判，实质也就是对专制制度的批判。与“君权神授”的思想相对立，十八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一般都继承了上一个世纪资产阶级思想家、特别是英国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人性论、自然权利论，社会契约论。但是由于法国资产阶级与上一个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不一样，不是在与封建贵族的联盟中实现自己的革命的，而采取了与广大群众联盟的道路。所以他们极力标榜自己是全民的代表，鼓吹“自由、平等、博爱”的虚伪口号。似乎这就是人所固有的“理性”，并且声称：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要受到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因而，‘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

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做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从今以后，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反杜林论》第 14—15 页）

其实，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同上，第 15 页）广大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始终是在这些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视野以外的。因此，在革命后，很快便彻底暴露了他们的世界观，本质上是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立的。

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准备时期，也出现了反映贫苦农民和早期无产者利益的思想代表。恩格斯说：在每一次大的资产阶级运动中，“都爆发过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多少发展了的先驱者的那个阶级的独立运动”，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社会主义在它的最初的代表那里，虽然就其理论形式而言，“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实质上，它却是正在发展中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阶级对立的反映。这些“现代无产阶级的多少发展了的先驱者”当时虽然还主要是作为一支反封建革命的主力军出现的，但是，它的代表，已经在探索与资产阶级利益相对立的新的社会理想了。所以在法国革命准备时期，与资产阶级思想相对立，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也发展起来了，而且在法国大革命中，还产生了主张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的巴贝夫的空想共产主义。

## 第一节 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运动

路易十四在位末年，曾经盛极一时的封建专制制度，已经表现出行将崩溃的征兆了。1715年路易十五即位之初，摄政王奥尔良公爵腓力，曾采取了一些“自由主义”的措施，以期有所补救，但很快便失败了。所以资产阶级反封建反宗教的启蒙运动在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也就逐渐发展了起来。它最早的著名代表便是培尔。

### 一、培尔

比埃尔·培尔（1647—1706）是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先驱。马克思曾引用一位法国作家的话说：“培尔对十七世纪说来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者，而对十八世纪说来则是第一个哲学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2页）

培尔出身在离土鲁斯不远的科拉城的一个新教牧师家庭。曾在土鲁斯大学和日内瓦大学读书，以后在色当的新教学院任哲学教授。由于信奉新教、反对天主教而受到迫害，最后不得不离开法国，移居荷兰，任鹿特丹大学教授。但未能见容于荷兰统治当局，终于被免职。他的主要著作是：《历史批判辞典》（1695—1697）。

他最初站在新教方面，反对天主教，后来他的思想，越来越激进，连新教也怀疑了。在《历史批判辞典》一书中，他对宗教表示了怀疑的态度，颂扬人的“理性”，并对作为信仰的支柱的十七世纪‘形而上学’作了批判。

培尔认为，理性与信仰是对立的。他说：“不要企图理解

神秘的东西”，因为，“如果你能够理解它们的话，它们就不再是神秘的东西了。”他甚至劝哲学家们不要企图去减轻神秘的东西的荒谬性。他说：“谁不知道荒谬性就是神秘的东西的本质成分呢？”虽然他还没有反对信仰，但是他却以“理性”打击了信仰，剥夺了信仰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为理性争取了地位。给后来的启蒙思想运动，作了一定的准备。

培尔还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他着重是从道德上去反对宗教的。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法国，天主教教会以道德的化身自居，并极力为封建专制制度作论证。培尔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认为强迫人们信仰天主教，迫害新教徒都是不道德的；而且天主教的所谓“灵魂不死”等道德原则，也并没有妨碍相信它的人仍然可以是个坏人。相反地，不相信它的人也有许多好人。如果我们暂时不问培尔所说的坏人和好人是按什么标准而言的，那末很清楚，他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证明道德是独立于信仰的。这就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神圣的外衣。

从这种立场出发，培尔大胆地假定了：不相信上帝、不相信来世的无神论者所组成的社会是可能的。而且，他说：如果这些人热心于保障公共福利，压制作恶的人，阻止争吵，支持孤儿寡妇的权利，鼓励公平往来，那末，这个社会完全可能是一个最文明的社会。

基于这种对宗教的怀疑论，培尔批判了十七世纪那些为宗教作论证的“形而上学”或思辨哲学，特别是莱布尼茨的神正论和“先定和谐”说。他认为根据“理性”来看问题，莱布尼茨的思想是无从证明的；而且，如果莱布尼茨的思想是正确的，那末世界上的罪恶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同时我们有什么根据对犯罪者进行惩罚呢？培尔也不同意斯宾诺莎把实体

称为神。他认为，每一个物体都是独立的实体。马克思对于他的这类批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他是“使 17 世纪形而上学和一切形而上学在理论上威信扫地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 第 162 页）

当然，培尔的批判是很不彻底的。他一方面批判了宗教和“形而上学”，另一方面又主张仍然要保留宗教信仰；一方面相信理性，另一方面又怀疑理性的力量。他的历史作用是在于促进了十八世纪法国反封建的启蒙思想的发展。

十八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由于资产阶级力量的进一步壮大，反封建的启蒙思想便迅速发展了起来，形成了所谓启蒙运动。这些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虽然来自不同的阶层，但他们的主要倾向是一致的。他们主张尊重和启发人的“理性”、反对愚昧和偏见，争取“自由、平等”，提倡科学和进步，对封建迷信发动了相当猛烈的攻击。不过他们中间大多数人还没有根本否定神和宗教，而是主张自然神论。在政治上大多数主张所谓“开明君主专制”。他们对宗教神秘主义的批判，为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产生扫清了道路。这类思想家主要有：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孔狄亚克。

## 二、孟德斯鸠

孟德斯鸠原名夏尔·特·塞孔达（1689—1755）。出身于波尔多附近一个贵族家庭。1716 年继承伯父孟德斯鸠男爵封号。曾任波尔多法院院长。1721 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作品：《波斯人信札》，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以后，他曾游历意大利、瑞士、荷兰，英国。英国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对他有很大影响。他最主要的著作是《论法的精神》（1748）。

孟德斯鸠从大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批判，提出了温和的君主立宪的政治改革方案。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思想家，他不满足于本阶级的无权地位，所以在他看来，封建专制制度的不合理性，首先便表现在极端的社会不平等上。他说：在专制制度下，“君主、廷臣以及若干个人士，占有全部财产，同时别的人却全体呻吟在极度贫困中。”（《波斯人信札》第 210 页）在豪华的巴黎，往往“为一个人生活得十分舒服，必须有一百个人为他不停地劳动。”（同上，第 182 页）更为严重的是，在这种制度下，君主一个人集中了无限的权力，谁只要稍不顺他的心，就可以将谁处死。他认为，这种制度不仅是不合理的，而且是注定要灭亡的。因为它的权力是建立在横暴的统治上的。如果没有庞大的军队，那末“他们的江山连一个月也难保。”（同上，第 175 页）

孟德斯鸠认为封建专制制度的不合理性还表现在，在这种制度下，必然引向道德上的堕落。他说，这只要看看宫廷贵族的性格便可明白了。这些宫廷贵族最显著的性格就是：“好闲逸而有野心，骄傲而卑鄙，希望不劳而致富，憎恶真理，谄媚，背信弃义，不遵守一切诺言，蔑视公民职责，惧怕君主有品德，希望君主有弱点，而且比这一切都糟糕的是，永远向品德嘲笑。”（《论法的精神》第 24 页）

孟德斯鸠相当广泛地研究了各国的政治制度，企图从中寻找改革的根据，提供某种改革方案。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一开始，他便指出：“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存在物都有它们的法。”（同上，第 1 页）正是在这种前提下，他反对宗教神秘主义、主张自然神论的观点

他不否定上帝。但是，他认为上帝既不能任意地创造一切，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干预一切。他只能根据一定的法则办事。在他看来，物质的运动固然是上帝给予的，但物质世界却是永远存在的。他说：“我们看见：我们的世界是由物质的运动形成的，并且是没有智能的东西，但是它却永恒地存在着。所以它的运动必定有不变的规律。如果人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之外再想象出另一个世界的话，那末这个另外的世界也必有固定不易的规律，否则就不免于毁灭。”（同上）有时，他甚至说，根本用不着上帝，单凭我们的理性，就足以打开这个无理性的“混沌乾坤”，用一种简单的机械道理，就能够解释这个“神圣建筑”的秩序。他的这些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了机械唯物主义。

孟德斯鸠关于客观世界存在着“固定不易的规律”的思想，应该说是反对宗教神秘主义斗争中的一个积极的成果。但是当他分析社会现象时，他又完全陷入了唯心主义。他一方面认为，不能说人“单纯是跟着幻想走的”，各种政治制度，也应有一定不易的原则，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这个原则就是政治制度本身，其他的一切社会现象都是由政体决定的。所以寻找社会政治制度的原则，变成了寻找一个所谓合理的政治制度。

从资产阶级的“自由”观出发，孟德斯鸠认为最合理的政治制度应该保证各种权力能够互相平衡、互相制约。于是他提出了著名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说。按照这种理论，应该说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是最“合理”的了。因此直到今天这一分权说仍然是资产阶级专制的民主外衣。但是，大资产阶级的立场，又使得孟德斯鸠深怕广大群众可能分享

到了政治权力，所以他又宁愿保留君主制度，不过不能是无限的君主专制。因此他所理想的政体是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

孟德斯鸠认为，决定政治制度的诸因素中，地理环境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幅员的大小，气候、土壤等地理条件，对这个国家的政权形式、法律性质、道德面貌、风俗习惯各个方面都有决定性的影响。例如，“炎热国家人民，就象老头子一样怯懦，寒冷国家的人民，则象青年人一样勇敢”（同上第 228 页）亚洲之所以出现专制主义的大帝国，是因为它“有较大的平原”，而欧洲之所以有民主自由是由于“天然的区域划分成了不大不小的国家”等等。这种片面夸大地理环境作用的观点，是十分错误的，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外因论。毛主席指出：“社会的发展，主要地不是由于外因而是由于内因。许多国家在差不多一样的地理和气候的条件下，它们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非常之大。同一个国家吧，在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的情形下，社会的变化却是很大的”（《矛盾论》）在帝国主义时代地理环境决定论变成了反动资产阶级的地理政治学派为帝国主义进行侵略和压迫作辩护的思想武器。但是，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对于封建主义的批判和三权分立的学说，为十八世纪法国革命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准备，起过进步的作用。

### 三、伏尔泰

弗朗索瓦·马利·阿■埃，笔名伏尔泰（1694—1778）是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和哲学家。他出身在一个富有的资产阶级家庭。曾在耶稣会办的贵族学校受教育。毕业后，由于他反封建反宗教的思想，两次被关进巴士底狱，两次被流放，还曾被驱逐出境，流亡到

了英国。在英国他深受牛顿和洛克的影响，对英国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也极为推崇。回国后，于 1734 年出版《哲学通讯》。这本书一出版，立即被当局判决焚毁，因此他又不得不逃匿到他的女友夏特莱侯爵夫人的庄园，在那里度过了十年。出版了《牛顿的哲学》（1738）。晚年住在法国和瑞士交界的费尔奈庄园里。他的重要的哲学著作还有：《形而上学论》（1734）、《哲学辞典》（1764）等。

作为一个文学家和哲学家，伏尔泰以他特有的生动文笔，对封建专制主义以及天主教教会的黑暗统治，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提出了“打倒卑鄙无耻的东西”的口号。伏尔泰认为，封建专制制度下的法国，全国各地各自为政，人民的“自然权利”横遭蹂躏，僧侣贵族却享有特权，可以为所欲为而逍遥法外。因此专制制度使国家陷于落后与混乱，使人民陷入贫困和堕落。这种批判反映了资产阶级争取“自由、平等”和统一国内市场的要求。

伏尔泰对天主教教会尤为深恶痛绝，他曾经豪迈地说：“我讨厌听说十二个人创立了基督教，我要证明一个人就足以摧毁它。”他认为，基督教“无疑是最可笑的，最荒谬的和最残酷的。”它是“如此之多的分裂、内战和罪恶的根源”。他说：“为了神学的论争，五百年来，有时在这个国家，有时在那个国家，鲜血流遍满地，洒上绞刑架和断头台，差不多没有间断。这种灾难之所以长期持续，就是由于人们常常为了教条而忽略了道德。”对宗教裁判所的罪行，伏尔泰更是愤慨。他说，这个组织犹如拦路抢劫的强盗，不过强盗只要你的金钱，宗教裁判所则要拿走你的一切，包括你的思想和生命。所以，一部教会史，就是“一连串胡作非为，抢劫谋杀的历

史”。

在伏尔泰看来，宗教蒙昧主义，是人类理性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它剥夺了“人类最宝贵”的东西：财产和自由。所以，在他的笔下，什么教皇、主教、神甫……都是一些“文明的恶棍”、“两足禽兽”。在《天真汉》一文中，他让一位神甫被迫承认：“我们中间有的是反复无常的小人，卑鄙的流氓。”（《老实人》第 188 页）“我没有力量做什么好事，我所有的权力只限于偶尔做几桩恶事。”（同上，第 227 页）

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伏尔泰曾被人们称为“无神论者”。其实他并不是一位无神论者，只不过是一位主张宗教宽容的自然神论者。他曾说过，“即使没有上帝，也要造出一个上帝来”。他也不同意培尔关于可能存在无神论者社会的观点。他说：“即使你管理一个村庄，那就必须有一种宗教。”（《哲学辞典》英文版第 5 卷第 369 页）这清楚地表明了他作为一个剥削阶级思想家的局限性。

伏尔泰深受牛顿思想的影响。他认为牛顿的物理学，提供了对世界的最正确的看法。按照这种看法，世界是一部庞大的机器，它惊人的协调性表明了是一位伟大艺术家的杰作；或者表明了有一位最高的理智实体，即神存在。神是自然运动的最初推动者。

他认为自然界的存在是无可怀疑的，而且它有着不变的运动规律。至于一定要问什么是物质，那末它与什么是精神，什么是上帝一样，同样是不可认识的。因为这是超出我们理智范围的事。但是我们可以认识物质的特性及其运动规律。他说：“我（自然）不是一个数学家，但是我和在我之中的一切是依照数学的规律安排的。”（同上，第 101 页）而且他认为

这些规律凭着它们的本性发生作用，便能产生出自自然界的全部多样性。

从这种机械论的自然观（不过是不彻底的）出发，他对十七世纪的思辨形而上学也有一定的批判，他说，什么叫“形而上学”就是听者不懂说的是什么，而说者自己也不懂他说的是什么。他认为莱布尼兹的单子论就是这种东西，我们不了解它，正如他自己也不了解它一样。在他看来，这种思辨形而上学，在理性中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必须抛弃。

伏尔泰在哲学上的贡献之一，是最早在法国热情地宣传了洛克的思想。在他那里，洛克和牛顿一样，是无可怀疑的权威。他认为，洛克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关于“本质”、“实体”等一切形而上学的争论。在他看来，离开了经验材料的争论都是毫无意义的。所以，他说：“我有形体，我思想。此外我就知道了。”（《哲学通信》第 53 页）

他完全同意洛克的经验论原则，即我们的一切观念都来自经验。凡是不能直接经验的东西，他都斥之为形而上学。他责备笛卡儿“不研究自然、却要推测自然”（同上 第 212 页）并把笛卡儿的哲学称为“巧妙的小说”。对于笛卡儿的二元论，他也是不同意的，他认为把思维和身体分割开来是没有根据的。他说如果思想仅仅属于非物质的灵魂，那末就要承认灵魂没有一刻不在思想。但是要承认人身上有这样一种实体是荒谬的，而且我们也看不出为什么物质不能思维。不过他又不敢得出唯物主义的结论，他只敢含糊地说，正如神使我们的身体构造得能饮食、能消化一样，它也使我们的身体构造得能思想。

对于笛卡儿的“天赋观念”，他是完全不同意的。他说，

只有我们的感官才能为我们提供一切观念。如果认为观念是“先天”的，那是荒谬的。他讥讽说：“笛卡儿断言，人总是在思想，并且断言，灵魂入窍时是带有一切形而上学概念的，认识了上帝，空间、无限，具有一切抽象概念，总之是满腹经纶，只可惜灵魂一出娘胎就都忘光了。”（《哲学通信》第 51 页）和笛卡儿相反，他认为人只有来自经验的种种观念，不可能有“天赋观念”。没有感觉经验，便不会有种种观念。

伏尔泰也承认感觉经验是外物作用于我们感官的结果，并不是主观的幻觉。他在驳贝克莱式的主观唯心主义时指出，如果经验不是外界对象作用的结果，而仅仅是我们想象力的产物，那末为什么我们在碰到火时会感到烧痛，而在梦中以为碰到火的时候，却并不感到被烧痛。

但是，正如上面已经指出的，伏尔泰并没有能把唯物主义的原则坚持到底，他不仅没有否定神的存在，而且以为经验也证明神的存在。

这种不彻底性显然是与他政治上的妥协性相联系着的。他虽然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和宗教神秘主义，但是他认为真正配受理性的启导、参与政治的，只有“上等人”，广大群众，只配受“奴役”；如果人民群众也开始议论政治，那末一切都糟了。所以他不完全同意“人生而平等”的说法。他说：“平等既是一件最自然不过的事，同时也是最荒诞不经的事”，（《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 91 页）在他看来，人生来就有一种相当强烈的喜爱统治和财富的倾向，所以人与人之间不可能平等。同时他认为社会生活也必然要把人们分为支配者和服侍者，否则社会便不能存在下去。这种观点，实质上是反动的。

当然，他所设想的统治，不可能是无条件的君主专制。

从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他认为一切统治只有符合人的“自然权利”才是合理的。所谓“自然权利”按照他的解释，最主要的便是“人身和财产的自由”。在《哲学通信》中他明确表示，他所描述的理想制度，在英国“事实上已经达到了完善之点”。这就十分清楚，他的理想制度是君主立宪制。

所以总起来看，伏尔泰在批判天主教，宣扬牛顿和洛克的思想方面是有贡献的，但是他的政治态度是比较保守的。

#### 四、卢梭

让·雅克·卢梭（1712—1778）出生于日内瓦一个钟表匠家庭。成年以前就离开了父亲，给一个雕刻匠当学徒，由于受到师傅的虐待而逃亡，长期过着流浪生活，常常寄人篱下，当过仆从、秘书、家庭教师、乐谱抄写员等等。1741年移居巴黎后，曾一度担任法国驻威尼斯大使的秘书。1745年回到巴黎，在这里定居了十多年，结识了当时很多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并且陆续发表了：《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1749）、《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5）、《新爱洛依丝》（1761）、《社会契约论》（1762）、《爱弥儿》（1762）等。由于他在这些著作中揭露和批判了现存制度，因此不断受到统治阶级的迫害，1762年使他不得不逃亡出国。又经历了八年的流浪，1770才回到巴黎。

在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中，卢梭是比较特殊的一个人。早年寄人篱下的流浪生活，对他的思想有一定的影响。他在晚年写的自传性作品：《忏悔录》中，曾叙述他青年时因遭到虐待而产生对于“残暴和不正义”的反抗意识，并逐渐形成了反对暴君统治的思想发展过程。在他的著作中，不仅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的压迫，同时还进而批判了私有制的严重

的社会恶果。但是他并没有从此得出否定私有制的结论，只是提出了一些在当时较为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理想。

贯串在卢梭的全部著作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即探究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以及克服这种不平等的办法，这也是卢梭思想的精华之所在。但是，他在探讨这个问题时，是从资产阶级人性论出发的。所以他得出的最后结论是错误的。

他接受了十七世纪以来极为流行的“自然状态”说。按照这种理论，似乎人类最初是生活在没有任何社会联系的状态、即“自然状态”中的。卢梭把生活在这种状态下的人称之为“高尚的野蛮人”，说他们漂泊在森林中，“没有工具，没有语言 没有住所”（《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 106 页）实际上和禽兽差不多。虽然对于这种状态的真实性的真实性，卢梭也表示过怀疑，但是他仍然认为，这必须成为我们思考的出发点，只有对“这种状态具有正确的观念，才能很好地判断人类现在的状态”（同上，第 64 页）

这样，卢梭便完全抛开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即阶级关系，企图从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人类一般出发来分析社会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所研究的不是这个或那个国家的人，不是这个时代或那个时代的人，而是“整个人类”。这当然是极其错误的。脱离社会关系的人是没有的。马克思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卢梭的“自然状态”决不是由于对现状的不满而引起的对原始的淳朴生活的回忆与留恋，而是对正在成熟中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展望。因为资本主义关系只有在打破了一切传统的封建束缚，似乎人人都是“自由、平等”时，即互相“独立”时才能充分发展起来。同时，在无政府状态下的自由竞争中，个人（其实仅仅是人格化的资

本)似乎都是一些“孤立的原子”。当这些事实反映到根本不懂得历史辩证法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头脑中时,这些本来是从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个人”现在便成了历史的出发点。“合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所造成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34页)又因为这种“孤立”的个人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的关系)当时还没有成为全部现实,所以“在十八世纪预言家们看来……,这种个人是一种理想,它的存在是过去的事”(同上,733—734页)于是便成了所谓“自然状态”。

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正是通过这种“自然状态”说,把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的本性,抬高成为全人类的“本性”。于是资本主义关系也就成了唯一合乎人的“本性”的合理的制度。卢梭对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解释,虽然与其他启蒙思想稍有不同,然其实质是完全一致的。

卢梭认为由于私有制的产生,便由“自然状态”过渡到“文明社会”,这时人就失去了“天赋”的自由和平等。他说:“从前本是自由、自在的人,如今由于无数新的需要,可以说已不得不得受整个自然界的支配,特别是不得不得受他同类的支配”了。“这一切灾祸,都是私有财产的第一个后果,同时也是新产生的不平等的必然产物”。(《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125页)

不过这一类大量的揭露和讽刺,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卢梭并不否定私有制。他认为私有财产,不仅是“文明社会真正的基础”而且也是“公民事业真正的保证”。它是“一切公民权中最神圣的权利,它在某些方面,甚至比自由还更重要。”(《政治经济学》第25页)同时,他对私有制的产生,即